

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 总主编/柳无忌 第二套 主编/谷文娟 高铨 杨玉峰

南社人物吟评

邵迎武 著

迎武 著

南社人物吟評

趙樸初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南社人物吟评

邵迎武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10.875印张 270千字

印数00001—1200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507-3/K·50

定价: 11.6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柳 无 忌

二十世纪初叶崛起于文人汇集的大江南北的提倡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其历史距今已有八十余载，却仍能号召着国内外对人文社会科学有兴趣的人士，纷纷在各地发起南社研究，自北京至南京，包括南社发源地的江、浙、上海，乃至广东，以及香港、台湾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远达美、欧、澳三洲。这些南社爱好者先后在海外与国内组织了南社学会^①，联合起来，以探讨和评介南社对于近代中国文学与民主革命的贡献，并扩大了南社研究的学术领域，形成一门新兴的南学。可是，经过历史的变迁，在兵马荒乱之际，除少数以外，南社作家的诗文遗著正在逐渐散失，他们的声名几将湮没无闻。因此，我们认为发扬南学有两件应做的工作：（一）我们要抢救现尚幸存的各种南社资料，把它整理出来印行问世，给予今日和来日的南社研究者以文献有征的便利；（二）我们将尽力为南学的成果培植一个读者园地，使其灿烂的累累果实，得到游园者的欣赏和赞美。

为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国际南社学会拟订了一份《南社丛书》^②的出版计划。今日，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得到多数南学同志的支持与协助，我们高兴地盼望着这部丛书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

根据预定计划，《南社丛书》分若干套，每套十种，陆续印行。其类别有三：（一）南社文献，亦即南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DK 16/155

我们所遗憾的，没有经济力量把柳亚子等编的《南社丛刻》二十二集与《新南社社刊》一册重印问世，亦未能复制胡朴安编的《南社丛选》十二册；但作为学会的贡献，我们将在《丛书》内刊出以新颖的方式、按照作品的内容分类、选择一百二十位社员的诗、词、文编成的一部篇幅浩瀚的《南社选集》。令人兴奋的，我们最近得到了，并将首先刊行、新发现的柳亚子手编《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与二十四集的未刊稿。我们拟重印南社唯一的小说集，加以增补校订；同时，我们已编出一册《南社诗话集》，以为此类著作的先声。（二）南社作家的诗、词、文遗著，包括南社发起人陈去病，与南社有密切关系的高吹万、姚石子，以及南社重要作家如林庚白，傅钝根，刘季平，沈眉若，沈颖若诸人^③。

（三）有关南社的著作，从综合的南社研究以至个别的社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以南社的历史为研究中心，在《丛书》内即将刊出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南社史长编》。此后的研究对象可扩大为南社与近代文学的关系，它对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部份的贡献，以及南社作家的评传和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等。这些南学的重要课题，亟待研讨，期待其早日完成。

作为南学的引导，让更多读者了解南社人物的阵容，《丛书》将推出百人以上的《南社人物传》，并辅以百绝句的《南社人物吟评》。虽然出版界已有好几种有关苏曼殊与柳亚子的书籍，但是对于他们的专题研究而有特殊成绩的作品，仍将列入《丛书》之内。因此，除了印行《吴梅评传》外，我们亦拟刊出《苏曼殊新传》，《苏曼殊资料集》，《柳亚子诗歌初探》等著作。

上列各书将于正在编集的第一套、第二套《南社丛书》内陆续出版。这是我们工作的开始，尚须继续努力，完成这个重印并创造南社文献的巨大计划。为争取时间，各书的付排，拟依照稿件收到的次序以定先后。这两套《丛书》亦将同时在两家出版社^④分别印行，俾得早日呈献读者之前，迎接此后其它各套丛书的问世。我们希望这份工作能有所成就；更欢迎研究南社的学人

和社团与我们携手合作——南学的前途无量！

1992年5月

写于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三周年纪念

① 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于1989年5月4日，秘书处设在香港；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于1990年11月13日在北京成立。南京与上海都在筹组南社研究会，广东南社研究会最近即可成立。

② 此后在本文内简作《丛书》。

③ 柳亚子与苏曼殊的著作已有多种全集、文集、诗词集、选集等印行流传。

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前 言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以文章相砥砺、以气节相标榜、以诗歌相酬唱的著名革命文学团体。它成立于1909年，无形解体于1923年，前后虽仅14个年头，但长期主持社务的“南社灵魂”柳亚子却认为如同“一部二十四史，总觉得写不起来”。胡寄尘亦因“事情太难，实在办不到”而对《越风》杂志关于介绍南社的约稿加以推辞。即此足见，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并为后人对历史的再认识提供实体性的存在，往往比对其进行削足适履式的主观臆断难得多。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基本的参照背景，俾使读者从政治、哲学、历史、文化各个角度对本书所“吟评”的132位南社人物进行综合把握与立体观照，笔者拟就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力图从“史”的角度对“南社始末”作一扼要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南社分化、衰落过程的发生机制、内在规律以及南社的历史功绩予以必要的论析。

—

南社诞生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风雨年代。其筹备工作自1907年始。

这一年可谓我国近代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徐锡麟在安庆谋刺恩铭，秋瑾于绍兴就义，杨卓霖遇害，潮州黄冈、惠州起义先后受挫，黄兴两番进攻钦、廉一带，并偕胡汉民袭取广西镇南关，亦相继失败……这一系列事件对南社的成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纪念秋瑾，陈去病拟在上海召开追悼会，激励革命党人

“前仆后继”，戮力反清，惜未果！为进一步联络被迫逃亡、星散四方的革命党人，陈氏遂与刘三、吴梅等筹组神交社。1907年7月29日，陈氏在《神州日报》上发表《神交社雅集小启》，该文简略回顾了明末文人的结社盛况，然后愤怒抨击清王朝“文网日张”、“文人结社几与烧香拜盟同悬厉禁”的文化统治政策的狡黠狠毒，并矢志广结同人，“欢然上下其议论”。同年冬，刘师培、何震夫妇自日本归国，柳亚子邀约他（她）们及杨笃生、邓实、黄节、陈去病、高旭、沈砺、朱少屏、张家珍等人在上海酒楼小饮，决定成立南社。后因陈去病赴杭（1908年7月）邀众祭奠秋瑾，被清廷发觉，被迫逃往汕头；1908年冬，陈氏又患足病，经半年始愈，南社的成立亦因之延期。

1909年11月13日，阅尽千劫的虎丘塔下，又一次腾跃起沉埋已久的剑气；这一天南社宣告成立。以这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为橇，中华民族那种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抗争精神，伴随着忧愤、悲叹、屈辱和仇恨，以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在唏嘘扼腕的文人志士心目中复活了。尽管迫于清廷的高压政策，关于南社命名的含义在一些公开文告中说得较为含蓄隐晦，甚至相互矛盾。如宁调元于1908年在长沙狱中撰写的《南社序》中，运用《左传》中所记载的钟仪被囚晋国犹弹奏楚国南音的一则故事，藉以宣喻“南社”命名的反清性质（所谓“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陈去病在《南社长沙雅集纪事》中亦云：“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而作为南社发起人之一的高旭则摄于清廷的淫威，不无媚态地解释道：“‘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原无分于南北，特以志其始也云尔。”尽管如此，但南社的革命倾向，已昭然于世。柳亚子后来则迳直说道：“它（指南社——引者）底宗旨是抗清反满，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新南社成立布告》）

南社成立后，即开始编辑机关刊物《南社丛刻》。“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柳亚子诗），基于一种反清革命的激

情，南社社员这一时期创作的大都是“叫喊复仇与反抗”(鲁迅语)的作品，雄健刚劲，昂扬豪放；他们崇尚积极的浪漫主义诗风，“思以淋漓慷慨之音，一振柔软卑下之气”(周实《〈无尽庵诗话〉序》)。以故，宋教仁于1911年8月5日在《民立报》上撰文赞曰：“四集辑录社员新撰著，计文三十四篇，诗三百七十一首，词一百二十四阙。其间感慨淋漓。可诵之篇不鲜也。”李叔同亦评介道：“所诣皆雅正道上。复多折衷新理，有关社会向导之作。……谓之近时名著，夫复何疑！”(见《天铎报》，1911年8月12日)。由于《南社丛刻》仅限于发表文学作品，故尔许多社员同时还在其它报刊上发表鼓吹反清革命的文字，南社的影响亦不断扩大，至1911年2月，闻风慕义而入社者已增至193人。几乎与此同时，越社(南社在浙江的分支机构)、粤社(南社的广东分社)、辽社(南社支社)以及与南社桴鼓相应的以“因文学而导其保种爱类之心，以端其本”(姚光《淮南社序》)为宗旨的淮南社相继成立，更有宁调元、周实、苏曼殊、刘三、马君武、黄侃、范鸿仙、林白水、宋教仁、陈其美、田桐、叶楚伦等纷纷入社，进一步壮大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迨至武昌起义前，南社社员已发展到228人。辛亥革命后，南社的声势更加浩大，阵容也更为强壮，众多精英(如杨杏佛、李叔同、仇亮、沈钧儒、黄兴、程家桢等)相继入社，截止至1913年初，南社成员已增至400余人，遍布各地。仅从当时的全国文化中心上海来看，主持笔政者大多为南社社员，如《民立报》为宋教仁、于右任、范鸿仙、叶楚伦、陈英士、徐血儿等；《神州日报》为黄宾虹、王无生；《大共和报》为汪东；《时报》为包天笑；《天铎报》为邹亚云、陈布雷、李叔同；《民权报》为蒋箸超、戴季陶；《民国日报》为邵力子、成舍我、闻野鹤；《太平洋报》为姚雨平、陈陶遗、柳亚子、苏曼殊、胡朴安、胡寄尘、陈蜕安、姚鹓雏等；《民声日报》为宁太一、汪兰皋、黄侃等，可谓盛极一时！成舍我后来曾回忆道：“当时在上海，若不是南社的成员，不大能够进报馆当编辑。”有一时期，汪精卫任南京

行政院长，邵元冲任代理立法院院长，居觉生任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叶楚傖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无怪乎柳亚子喜不自禁地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关于〈纪念南社〉》）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发生急剧逆转。精通权术的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纵横捭阖，将朝廷权力集于一身；旋又凭仗北洋军队的军事实力，运用军事进攻与议和的两面手法，终于胁迫南京众议院以合法形式将其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仅存在3个月，中华民国名存实亡。接下来便是军阀割据、善后借款、“洪宪帝制”、张勋复辟……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蔡济民《书愤》）。“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黄兴《三十九岁初度作》）。随着政治风云的骤然变幻，南社内部的营垒对立也日趋明朗，社员们在不同的旗帜下开始分化。以柳亚子、陈去病、范鸿仙、杨铨、仇亮、程家桢为代表的南社社员依然坚持革命立场，他们愤于窃国巨奸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行，或撰文声讨，或投笔从戎；更有不少南社社员拒贿辞官，标榜气节，表现出不畏斧钺的强项风骨和英勇无畏的抗争雄气。南社社员、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虽主张与袁氏妥协，但峻拒袁氏的重金收买，积极从事议会斗争。而一部分具有狭隘的“排满”意识的南社社员在民国成立后，便以为革命目的已达，不复与时俱进。另有一部分利欲熏心的攀龙附凤之徒，“朝成美新之文，夕上劝进之表”，堕落为卖身求荣的官僚政客。面对政黯民怨、令人窒息的现实，一大批“寻路”的“倦客”既愤于腐鼠沐猴，滔滔皆是，又深感势单力薄，回天无力，遂倡立“酒社”、“消夏社”、“消寒社”，将一腔郁结，宣泄于流霞烟舸之中。柳亚子虽不满于以上诗社那种“倚然物外”、“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者矣”的出世倾向，自谓“胸中愤血，轮困盈斗。嚼雪饮冰，犹嫌其热”。（《消寒社录序》）并赋诗一绝（“袁安高卧太辛酸，党尉羊膏未尽欢。愿得健儿三百万，威

阳一炬作消寒”)以言心志。但蒿目时艰，除徒呼负负外，亦深感“无事可做”，遂亦参加“酒社”、“消夏社”之活动，盖“舍此百辈辈黄醅，畴能浇尽胸中块垒哉”。(朱剑芒《酒社诗录序》)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这种“分化”主要表现为“尊孔”与“反孔”。1912年6月，高燮、姚光等人在江苏金山发起成立以“扶持国故，交换旧闻”为宗旨的国学商兑会，得到南社复古派的呼应。他们矢志“发明孔学之真”，“继先圣之传，复宗邦之旧”，并声称要为“救护”孔学而“狂呼哀号”(高燮《国学商兑会成立宣言书》)。而柳亚子、宁调元等人则坚决主张“反孔”，破孔孟之道的“大蔽”(周仲穆《答顾秋岚书》)。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南社又进一步分化。如果说，在南社成立之初，共同的革命目标尚能将“多有异趣”的南社社员集结在“反清”、“反袁”的旗帜下，形成一定的政治凝聚力(在袁世凯称帝期间，“谄媚当途。掄杨权要”〈凌景坚《〈近代闺秀诗话〉序》〉的南社社员亦不过20余人)，那么，及至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南社内部则形同一盘散沙。尽管南社在组织上仍在继续发展(截止到1916年1月，已增至825人；及至1923年已增至1188人)，亦确有一些精英人物先后涌入南社(如于右任、邵力子、徐血儿、柏文蔚、杜国庠、邵飘萍等)，但也不乏骛名而来随流涌进的官僚政客和浮薄文人，就总体质量而言，毕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斯言极是。限于篇幅，此处不可能将新文化运动后南社的“种种变化”一一胪列，只拟简要地对1917年夏在南社内部发生的关于“同光体”诗的激烈论战作一介绍。

同光体，是近代各种宋诗派的总称，亦即陈衍所谓“同(同治)、光(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沈工庵诗序》)。这一诗派对清末民初的诗坛影响甚大，他们力倡复古、刻意摹拟宋诗，

反浅易、尚晦涩，尤其是同光体的代表诗人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等人公然“赞颂旃裘，诋谰民国”（凌景坚《〈近代闺秀诗话〉序》）；所作诗词，亦无非是抒发亡国大夫、遗老孤臣的黍离之悲，为柳亚子等人所不齿。但在1917年张勋复辟达到高潮之际，姚鹓雏、胡先骕、闻宥、朱鸳雏、成舍我等人竟相继大肆吹捧同光体，并声称郑孝胥等人“对于清廷，未尝迎合干进”（朱鸳雏《平诗》），嗜痂成癖地对其予以美化。对此，柳亚子基于“为国民骚坛树先声”的政治立场，对朱鸳雏等人“荒谬绝伦”的谰言进行了愤怒的驳斥，并明示对朱鸳雏等人这种“犹袭同光之体，日为之张目”，“复欲再亡我中华民国”的复辟行径“必不能容”，“必须鸣鼓而攻之”（《斥鸳雏》）。理屈词穷的朱鸳雏恼羞成怒后，竟对柳亚子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并继续吹捧郑孝胥在民国建立后能“敛迹自好”，谩骂柳亚子、吴虞为“狗党狐群、物以类聚”（《斥妄人柳亚子》）。柳亚子一怒之下，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发表紧急布告，宣布将朱鸳雏、成舍我“驱逐出社”。

在这场“搅得最厉害”的南社内讧中，柳亚子虽得到陈去病、凌景坚、吴虞、杨杏佛、王德钟、叶楚傖、余十眉等南社社员的大力支持，但自此以后，柳亚子一直心绪萧索、情怀抑郁。尽管蔡哲夫以广东分社同人的名义所进行的拟改推高吹万为南社主任的分裂活动未能奏效，尽管在1917年10月10日的选举中柳亚子仍以385票（选票总共431张）蝉联南社主任；但柳亚子已无复当年的豪情胜概，南社也基本上陷于瘫痪，整个下半年竟未举行一次雅集。到了1918年秋季改选前，柳亚子在分寄选票时，另附决不担任南社主任的书面声明，并推荐姚石子为主任，以免社事中断。这样，南社就成为一个由主张“抱残守缺，空山独居”的复古派领导的保守、落后的组织。由于此时社中经费无着，加上人心涣散，南社的活动已基本停顿，仅于1919年在上海徐园举行过一次雅集；同年底，由姚石子自费印行《南社丛刻》第21集。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理，以每票五千元的价格收买议员。南社社员高旭、景耀月、马小进、景定成等十九人均接受曹锟贿赂，堕落为令人唾弃的“猪仔议员”。同年10月29日，陈去病、柳亚子、叶楚伦、邵力子、姚光等13人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斥责高旭、景耀月等19人“贿选祸国，辱及南社”，并公开声言“不再承认其社友资格”；同时冀望社友们“发表同一之态度，为中华民国稍留正气”（《民国日报》）。

贿选事件意味着南社的终结。是年底，仍由姚石子出资，陈去病编辑，出版了《南社丛刻》22集。从内容上看，这一期无非是一些诗文唱酬之作，已无复昔日的革命气象，亦与新文化运动的澎湃浪潮格格不入。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尝谓：“新文化潮流正在奔腾澎湃的潮流中，抱残守阙的南社就渐渐不为社会所注目，连社友也觉得无意味起来了。”事实上，自《南社丛刻》22集出版后，南社已无形解体（柳亚子后将手中余稿编辑《南社丛刻》23、24集，但未刊行）。

1923年5月，柳亚子接受了叶楚伦“南社的基础可以利用，放弃很为可惜”的建议，与邵力子、胡朴安、叶楚伦、余十眉（均为旧南社社员）、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徵等八人发起组织新南社，柳亚子亲自草拟《新南社成立布告》，声称“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足见新南社的宗旨与旧南社已有很大不同，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文学团体。从次年5月出版的《新南社丛刊》看，主要有沈玄庐的《最近的新俄罗斯》、《留别俄罗斯的小伙伴们的一封信》，邵元冲的《美国的新村运动》，刘伯伦的《中国的乱源》，陈德徵的《诗人拜伦底百年祭》，黄忏华的《哲学概说》等，还有刘大白的白话诗《秋燕》、《斜阳》等。译作有吕天民的《社会不平鸣》、苏曼殊撰柳无忌译的《英文潮音序》等，且一律用白话文，新式标点；与古色古香、日趋守旧的《南社丛刻》相

比，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新南社成立不久，南社湘集亦宣告成立。这个团体于1924年初由傅屯艮在长沙发起，同年4月正式成立，社长傅氏在《南社湘集导言》中声明这个团体以“保存南社旧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为宗旨。该社《简章》规定：社刊的诗文“均以文言为准”；“社友入社，不限省籍”；是故，南社的许多守旧派如蔡守、高吹万、黄宾虹、江亢虎等均先后加入，南社湘集遂成为一个由守旧派组成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该社的后期活动还带有反共的色彩。1930年7月，傅熊湘病歿安庆，该社活动暂时停顿。1934年，经刘鹏年发起，社务活动恢复；次年6月，蔡守发起的南社湘集两粤支部成立，许多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南社社员纷纷加入，人数激增至近300人。但北伐战争开始后，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这个团体的活动渐渐寂默无闻。与此同时，新南社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也呈现出新的分化，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后，许多南社社员经不起历史的严峻考验，相继落伍甚至变节；堕落为替地主买办阶级效劳的复古分子和反动政客的，颇不乏人；只有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少数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南社社员，能够继续坚持进步立场，紧跟时代潮流。

二

南社这个一度英气勃勃、声华颇盛的革命文学社团为什么会无可逆转地风流云散？认识和描述这一过程的发生机制并深刻揭示个中规律实乃南社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仍不多见。下面笔者拟对此略申管见，以俟公论。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被迫踏上一片充满屈辱与痛苦的历史沼泽地，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动荡，并非历史本身独立发展、瓜熟蒂落的结果，而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入侵，逼使中国在尖锐的中外民族冲突、文化冲突、社会冲突中走上一条“被近代化”的道路。空前深重的灾难，将一批又一批高

擎民族复兴火炬的爱国志士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变法之路，救亡之路，科学之路，实业之路……。充满危机的时代需要思想，一霎间，思想流派杂然纷呈，各种“理论”汗牛充栋；观念的撞击一个接着一个，思想的争辩一浪高过一浪……

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任何认识都首先建构在一个由主客体综合作用的“格局”之上；随着环境的刺激和主体的成长，这种“格局”不断扩展，使得结构日趋复杂化，最后达成逻辑结构。基于此，我们讨论问题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环境的刺激”等外部因素上，而必须对作为“主体”的南社社员普遍具有的文化心态特征予以特殊的关注。

首先，我们拟从文化心态的内在基础（即南社社员的文化心理素质，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生态度）入手进行讨论。

“分波终仗灵犀力，填海犹存精卫心”（宁调元《秋兴用草堂韵》）。翻览《南社丛刻》，似此凌厉飘发的诗作在在可见。这种“入世”激情无疑是对中国历代文人所奉行的“修齐治平”的儒家精神的一种纵向继承，也是近代知识者能够纷纷加盟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的内在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和“金瓯已碎”的忧患意识，无时不在驱策着广大南社社员奋袂而起，履险犯难，以实现建功立业的鸿鹄之志。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南社社员的文化心理素质，抽象地说，主要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用世精神。但必须指出，大多数南社社员所倾心的革命相对狭隘，只是在反清这一点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吻合，带有相当浓重的复仇色彩。他们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着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暴力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意义，使得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演化为狭隘的反满复汉。当辛亥志士以鲜红的热血溶化了千年帝制的冰山，不少南社社员便欲“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苏曼殊《致柳亚

子》，1911年），从而忽略了文化启蒙的艰巨使命和重大意义。事实上，政治体制的变革和文化观念的更新，是贯穿近代中国的两个相互交错的主题旋律，而后者往往更为艰难，因为传统文化并非一个简单的戳记，一个通过文言文的记载所构成的有形的符号世界，它那种经过千百年层层积淀而凝结在一个民族的个体逻辑思维的水平面下边的巨大的“潜意识冰川”，制约着整个民族的生存——文化空间，甚至也制约着那些卓越拔俗之士对传统文化以及自身的批判和省察。及至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的健将们才以“补课”的形式，弥补了南社社员这种单一的政治价值取向的重大缺陷。

如果我们将南社社员置放在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予以考察，便可清晰地看到，长期深受传统文化（包括道家、禅宗思想）影响而又缺乏文化上的自我更新的自觉意识的南社社员，其心理素质是绝非完善的。诚然，作为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生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构成，其中既有“乘天地之气，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绝对自由精神（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用世思想相贯通，遂成为南社社员反抗现实、张扬个性的精神武器），又有颇具宿命色彩的消极无为的主张，所谓“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认为人要“安时而顺处”，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来泯物我，同死生，超利害。庄子的这种人生哲学，对于历代文人用来维持心理平衡摆脱穷通进退的困窘无疑起到重要作用。至于究竟是“入”还是“出”，则要视具体境遇而对儒道两面作战略性的运用。对大多数南社社员来说，他们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淫，血液里有着传统文化的“遗传密码”与“遗传基因”；当传统价值体系在激进主义者“反传统”的批判声浪中日趋衰微、解体，当他们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一次次陷入“寻路”的迷惘时，这些与“传统”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层联系的

南社社员遂有一种文化失范感，由此衍生的文化疲惫，文化焦虑，终究导致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传统价值回归以实现文化自救。于是，“无用”乃大用的庄子哲学便在“用”这一现实生存的层次上获致生命。面对各种无可逃遁的矛盾冲突，南社社员们尽力化焦灼为宁静，穷通不惊，淡泊恬适，啸傲林泉，韬晦自守，以内在的心灵超越外在现实，以绝对圆满的静超越相对狭隘的动；揽读《南社丛刻》，反映这种“主体意向”的诗句几乎俯拾即是——

钟磬静弥永，莓苔古愈微。

——傅屯艮《山寺》

闭户深山不出去，芒鞋为恐踏残红。

——姚石子《春尽》

上方一夜耽禅悦，已觉尘劳转眼空。

——谢无量《宿玉皇顶》

看他应运兴龙虎，笑我忘机爱林泉。

——蒋蒋山《元胆》

笑他走马长安客，不解荒山着一鞭。

——徐枕亚《雪中访友》

诗人们似乎有意切断“我”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只沉浸在他们所建构的那种静远空灵的境界里，独标孤悖，棣通太音；尽管这种“静”的境界的获得是以淡化社会角色意识为前提的，但只要能够在这种环境中体味神韵飘逸的大道逍遥，一切也就被消溶在静寂虚空的内敛祈向之中。从南社社员们的绘画作品所流露出的审美情趣看，也不着迹相地显示出道家文化无所不在的渗透